

5G 赋能，锦绣崇明打造智能生态岛

本报记者姜微、朱翊

夕阳余晖映照在金色稻田，无人驾驶的收割机进退自如、精准收割；月上中天，5G 无人驾驶智能环卫车自动识别垃圾完成清扫……这样既富美感又充满科技感的场景，正在上海崇明岛化为现实。

11月29日，上海市崇明区发布《崇明区5G应用发展规划》，系统落实5G重点应用建设。此番“抢道超越”，为崇明建设成为首个5G智能生态岛奠定基石，致力于打造“智能+生态”的上海范例。

5G 发展规划全面启动 生态岛伸展智能之翼

2019年7月5日，上海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市5G网络建设和应用的实施意见》，宣告申城聚焦以5G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5G与城市建设管理、社会治理及各行各业融合应用，支撑城市高效率运行、市民高品质生活。

经过前期的探索和谋划，地处远郊的崇明率先发力，《崇明区5G应用发展规划》从3个维度、16个方向进行5G重点应用建设，包括生态农业、智慧旅游、城乡管理、医疗教育等具体应用场景。

“5G技术虽然是科技前沿的‘高大上’，但落脚点还是‘老百姓工作生活的日常’。”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拥抱和发展5G技术，作为我们实现生态惠民、利民的新途径，让5G的深度应用给崇明三岛老百姓带来高效便捷的生产生活享受，让每一位来到崇明的朋友都有难忘的5G体验，在最美的风景中感受科技时尚之美。”

崇明在5G技术布局方面“敢吃螃蟹”。8月，首个“5G智慧农机”在崇明万丰有机农场落地，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娴熟高效地完成稻田收割作业。10月，首个“5G远程医疗”在此完成，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刘岚医生通过5G网络，为身在城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先生完成实时的甲状腺超声检查和诊断。11月中旬，5G无人驾驶智能环卫车在崇明试运行，自动识别垃圾、自主避让，既能提高清扫效率，又极大降低了人力劳动强度。年内，崇明还将实现5G信号的全覆盖。

按照规划，5G技术将主要应用于崇明生产和生活两大方面，“智能”之翼让生产更高效，让生活更便利——全国首个智能化生态岛的应用蓝图已然展开。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西北端，众多往来船只航行在长江上(11月28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好风景的地方一定有“新经济”

天蓝水清、绿树成荫、水草丰茂、翔鸟归林，崇明三岛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把许多制造业、污染企业挡在门外，老百姓一度担忧“风景好是好，就怕吃不饱”。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扎根、开花、结果。

越来越多的人来崇明游玩，节假日当地旅店、民宿一房难求；绿色农产品广受好评，比同类产品卖得贵还卖得快，老百姓笑呵呵地说，崇明这里“风景越是好，越是吃得饱”。

好景色不仅让游客纷至沓来，也让高科技公司近悦远来，华为、电信、移动、联通、铁塔等大牌企业和复旦大学的科研专家为崇明发展5G的火热所感动，纷纷加入专班一同推动崇明的5G发展。

毗邻入海口的陈家镇，一个三千多亩的智慧岛产业园在此建成运营，已经入驻的上海声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汤敬华说：“在崇明智慧岛产业园工作，感觉就像在花园里上班，在窗口伸个懒腰，就看见美景如画，真是在密林中工作，在氧吧中呼吸。”

留住这些企业的不仅是如画的美景，还有丰饶的物产。随着5G技术的深入应用，不仅让入驻企业留得住，更让崇明的美景、美食借助5G网络输出得更远，描绘出崇明新经济的工笔画。

“用美景留住眼睛，用美食留住味蕾，用

品质留住人心。”崇明区农委主任宋学海告诉记者，“我们坚信好的环境一定有好产品，通过5G科技叠加生态，不仅让人和企业在崇明安居乐业，更能让我们有口皆碑的农产品和旅游资源输出得更快，走得更远，叫得更响，新经济的发展之路更顺畅。”

坚持“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的崇明，在大美之地加快布局新经济，财政和税收增幅近年来在上海名列前茅。一批涉及民生的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五美社区”等建设深入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随着2021年世界花博会将在崇明举办，崇明正加快园区场馆、大地景观、交通餐饮住宿等建设，并提升全球花卉资源配置能力。

崇明区区长李政透露，目前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设定的17个指标已提前完成9个，“下一步，让水实现‘出去的水不亚于进来的水’，让土变成生产沃土、生活净土，让林植入色彩，种出风景；让崇明从上海的‘后花园’变成长三角的‘中心绿地’‘中央公园’”。

5G+生态，让“海上花岛”插上智能的双翼，新经济活力四射。

“店小二”胸怀大战略 智能生态跑出加速度

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在数十年的接续发展中，从孤悬在外的海岛变成一颗横卧在长江入海口、熠熠生辉的“龙吐珠”。曾经的

偏远之地如今正利用前沿科技实现“抢道超车”，更是主动对接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宏伟战略，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生态岛。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崇明的优势，但也有“人、地、钱”的薄弱之处。崇明区委区政府一方面立足长远、对接大战略，通过高新科技来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俯下身子上好“店小二”，既投入硬件设施，更打造“软实力”，用精细化的管理与服务破解难题。

难题被逐一破解。人才缺，就筑巢引凤，强化党建引领，凸显实绩导向，持续激励现职干部担当作为，引入74名干部人才来崇挂职，146名“双一流”大学毕业生慕名报考。地不足，就推进3074户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完成乡镇郊野单元规划编制，变“无形地”为“有形地”。资金少，崇明一方面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另一方面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建设，用好市场资源。

“服务是责任，更是担当。等、靠、要不会有前途，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有出路。”唐海龙表示，崇明将以上海5G人居生态应用示范区建设为契机，营造更加浓厚的发展氛围，构建更加开放的发展格局，形成5G技术的研发、应用和产业同步发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来崇明追梦圆梦。

作为上海全面、系统落实5G应用发展规划的“先行者”，“生态”与“智能”在崇明这块热土上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破茧而出，而从“1”到“100”，崇明的步伐坚定有力。

飞虎哥上茶山

本报记者周文冲

这啥子人，一上山就让我们砍树？白马山村村民犯嘀咕，两米多高老茶树，砍成十公分，就剩个根根？干部把提议砍树的这人拉到一边问，刚才人多我没开腔，万一砍死了，怎么给老百姓交代？

“放心，等明年看。”飞虎哥说。干部村民最后商定，先砍一小片，看飞虎哥灵不灵。

这是14年前，飞虎哥刚上白马山，一来就拿老茶树动刀。白马山所在的重庆武隆区请他上山，就是为了救活老茶园。

村里老辈人说，白马山茶园自打清朝就有，最多时3万多亩。上世纪80年代，山上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可这些年，山上茶叶卖不上价，种玉米和红薯，老茶山长满杂草，偶尔摘几片叶，老百姓自己泡水喝。

我们的茶好喝，村民泡了一杯，端给飞虎哥。听说他专门研究茶，别人喝茶喝味，他喝一口，能说出品种、产地、开采月份、制茶工艺等等一大堆。来，给我们白马山的茶也打一个分。

飞虎哥抿一口，掀开盖子，看茶汤发红，问村民怎么制的茶。村民说，制茶不就是把锅烧热，茶叶倒进去炒干，好茶不就是这个色、这个味吗？

铁锅烧热，飞虎哥手背离锅边五公分，放三下，间隔半秒钟。现在手背感到刺痛，温度应该是150度上下，飞虎哥说。房间里挤进不少村民，飞虎哥掏出随身带的温度计，大家瞪大眼睛，和他说的几乎不差，真神。飞虎哥讲，这个温度下锅，炒出的茶叶才绿油油，香味正好。

村民头一回知道，茶还这么讲究。飞虎哥说，修剪茶树也和杀青一样，不是树越高茶叶产量就高，通过修剪让茶蓬变大，产量才越高。直到第二年，村民们才相信这些话。他们看到，飞虎哥上山时修剪砍矮的那片茶树，果然发出新芽，叶子胖墩墩，产量翻番。

之后每个月，在重庆上班的飞虎哥，都要抽几天上白马山。村民发现，飞虎哥不仅说，也和他们一起下地，手把手教他们除草、剪枝、开沟、上肥。

飞虎哥有点蹩脚的重庆话，说几遍村民们才能听懂，但是村民爱听，总把飞虎哥往自家茶园里拉。村民们说，飞虎哥讲的一学就会，学就会能用。

飞虎哥说，白马山种茶得天独厚。茶园平均海拔1200米，云雾缭绕，而且，山上冬天下的雪能冻死小虫，肥料、杀虫剂都省了，更能保证茶的品质。

这也给当地政府的信心。武隆区看准茶叶既是生态产业，又是能带动百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更多村民在自家玉米地上改种茶树，新栽一亩茶树奖励500元。

白马山又忙碌起来。到早春做茶季节，飞虎哥住山上。傍晚村民们带回一篓篓新采的叶子，飞虎哥就和村民们一起熬夜把茶炒青，做到早上三四点钟，村民们甚至都有了“迷信”：当年炒的第一锅茶，必须请飞虎哥在场，这一季茶的味道才不会错。

到今年，白马山上来采茶园已达到2000多亩。过去只产绿茶的白马山，因为提升了加工工艺，已经把高山红茶作为主打。红茶卖得比过去的绿茶贵，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

村民张明怀说，他在茶园打工，采茶季一天采2斤芽头，收入近200元。“我们农业社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全都回来了。有的种茶，还有的搞茶园农家乐。”在飞虎哥的建议下，当地政府还给村民们送了10多套手工制茶设备。“户户飘香，白马山才有茶村的氛围。”飞虎哥说。

现在，又到了茶园冬季管护的季节。为了明年开春第一口茶香，飞虎哥和村民们还要一直忙到12月中旬。

飞虎哥叫高飞虎，是重庆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脱贫攻坚帮扶武隆区的114名科技特派员之一。他扎根山区14年推广茶叶技术，获科技部授予的“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

贵州贞丰：“问诊于民” 冲刺脱贫

“先放有机肥，然后覆上土，再盖薄膜，你说合不合(对不对)嘛？”

“这是科学的，以前大家都不会种芒果，现在逐步掌握技术，我们搞产业就越来越有信心。”

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纳翁村，52岁的布依族村民何伦景掌握了芒果种植技术，让乡党委书记郑锐感到很开心。

位于滇黔桂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的鲁容乡，2014年贫困发生率为54%，被列入贵州20个极贫乡镇。郑锐告诉记者，芒果是鲁容乡的主打产业，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干部下沉到村逐项排查研究，“问诊于民”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随着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发展成为重点。通过向村民征求意见，大家反映主要的技术方面比较欠缺。驻村干部立即联络龙头企业，组织专门的芒果种植培训，像何伦景这样的村民现在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

民生无小事。贞丰县白层镇兴龙村由于石漠化严重，饮水一直是当地村民的难题，尽管近年来来自来水接通，但水压不稳定。前几天，驻村干部到兴龙村弄秀组村民家中走访，得知这一情况，立马组织人员解决。

布依族村民韦永英不会用汉语表达，儿子外出务工，她在家照顾孙子。通过村支书罗长飞“翻译”，记者才知道她要表达的意思，我也不懂怎么说，反正大事小事干部都来帮忙。

“吃的穿的住的，他们三天两头来家里问，水不来，他们找人修了两天，现在好了。”在村民罗光雄自家院坝里，他打开水龙头，可以看见水流通畅。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在外务工的人们逐步选择返乡。2017年6月，在浙江务工的罗光雄回到老家，在他看来，这一步走对了。

在兴龙村，大家都称罗光雄是火龙果产业园的“园艺师”。他过去没有技术，后来扶贫干部发现这一情况，想方设法帮他解决问题。“我现在掌握技术了，工资也相对高一些，每个月3000块。”他说。

贞丰县委副书记陈磊介绍，为全面掌握脱贫攻坚整体工作推进情况，今年10月31日以来，贞丰县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分段普查、分类普查、分级调度、交叉普查的方式，让7500多名扶贫干部下沉到村“问诊于民”，确保各类问题及时整改、各类短板及时补齐，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目标。(记者汪军) 新华社贵阳12月1日电



江西上栗：落实“河长制” 改善水环境

12月2日，上栗县东源乡河道保洁员在萍水河巡查。

近年来，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在全域实施河长制，大力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目前，上栗县共有各级河长134名，沿河村庄设有河道保洁员，同时发动广大志愿者参与水生态保护行动，确保河畅、岸绿、水清、景美。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超载3倍也能交钱放车，监管人员充当“车虫”

这里的超载超限大货车为何能畅行无阻？



新华社济南12月2日电(记者闫祥岭) 武城县位于山东德州市西部、山东河北两省三市六县交界处，是鲁西北、冀东南的重要交通节点；运河上的武城大桥，是太行山区建材、石料、煤炭等物资东运的必经之路。这里也成了大货车超载超限行驶的集中路段。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超载超限行驶问题屡禁不止的背后，是从事收费“领车”、帮助车辆逃避处罚的“车虫”猖獗多年。当地部分执法人员为“车虫”长期充当“保护伞”，导致超载运输大货车缴纳“领车费”后畅行无阻。

“车虫”经营超载车“地下交通站”

据记者了解，在武城县老城运河大桥桥头经营“庆华物流”的“王三”颇有名气，原因是他能帮助车辆逃避检查和处罚。他的公司打着物流幌子，实际上干的是“领车”的活。当地群众称，别人不敢走的路，他的车畅行无阻，“庆华物流”公司俨然成了超载车辆过境武城县的“地下交通站”。

“他们背后有人。” “标准载重40吨的货车，有的超载3倍，居然打个招呼就能通过检查，部分交警还从中分取‘领车费’。”有群众举报县交警大队部分交警存在以权谋私问题。

记者从事车司机处了解到，超载车辆经过武城县时，可以给该县“领大车”的人打电话，交通局的执法人员就不处罚，一开始每辆车给100元“领车费”，后来要给150元。

司机口中“领大车”的人就是“王三”，真名王庆华。武城县在调查中发现，该县交警大队二中队原中队长马胜才与王庆华交往密切。随即，马胜才为超载大货车逃避检查提供帮助，充当“保护伞”的问题浮出水面。2018年初，武城县监委对马、王二人进行立案调查。

“车虫”牵出腐败窝案

记者了解到，“车虫”王庆华通过送礼、请客等手段，获得了武城县过境超载、超限大货车的“带车权”，每车次收取120元至200元不等的“领车费”。

他不能独享这些钱，必须要按每车次100元的标准，以现金或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付给当地执法人员，才能顺利实现“领车”。

武城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马胜才收取每车次100

元至150元不等的“领车费”，然后按每车次50元至70元不等的标准，把钱分给交通局执法人员。几个月时间，马胜才就拿到“领车费”共计8万多元，他本人分得48000多元。

食髓知味的马胜才，并不满足于幕后“保护伞”的角色，还自己亲自“领车”，彻底沦为了“车虫”。

“我们查住超载货车，司机就会给马胜才打电话，马胜才就让我们放行。他会通过微信给我们转钱，这些钱是他的‘领车费’。”武城县交通局运管所、监察大队多名办案人员说。

王庆华还承认，自己用微信给武城县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张朝峰发红包94次，共计55300元。数年间，张朝峰贪污共计33万多元，并将其中9万多元装进了自己腰包。他的3名队员共同贪污31万多元，每人将7万多元据为己有。

作为中队负责人，处罚哪些车辆、开多少罚单、分多少钱，都由张朝峰说了算。他告诉记者，“当天收取的罚款都汇总，从收取的现金中拿出部分抵顶罚款任务，余下的现金和用微信收取的罚款，我就和一起参与执法的队员平分了。”

办案人员：案件特点鲜明，及时查处仍有较大难度

2018年以来，武城县纪委监委共处理县交警大队、县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88人，全部为基层一线执法人员。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人，移送审查起诉22人。目前，移送案

件均已被当地法院审理完毕，并对相关涉案人员作出判决。涉案人员以所在组织建制为单位共同犯罪是其一大特点。

武城县法院多份判决书显示：中队长马胜才与副中队长、2名队员一起受审，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张朝峰与3名队员一起受审，中队队长于勇与7名队员一起被提起公诉……塌方式腐败令人惊心。

当地纪委监委多位办案人员表示，当前查处交通执法领域腐败案件难度较大，这与此类案件在定性、定量、取证等方面的特点直接相关。

非法交易金额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一两千，但交易次数密集，交易总量大。违法行为与正常执法行为同时进行，具有隐蔽性。对于受贿的贿赂款一般以罚款的名义收取，有的部分入账，有的不入账直接私分，给行为准确性造成一定难度。

涉案时间跨度长，一些涉案金额的电子证据无法保存或提取。与此同时，交易渠道多，主要渠道是通过微信，也有现金交易、通过中间人转账交易等，给最终确定涉案金额带来难度。

涉案证人大多从事运输行业，流动性较大，有的证人考虑到自身行贿行为本身就违法，有的证人怕遭报复而不愿配合调查，给取证带来不小的困难，加大了案件处理难度。

去年以来，德州市纪委监委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路霸”“保护伞”问题，组建工作专班，重点排查、集中打击。目前有关工作还在进行中。